

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李蔚 刘能

内容提要 以聚居在沙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从空间视角出发,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以及外来流动人口(外来租户)与本地居民(本地租房户)在共居空间内的持续互动,使得这一“聚居—混居”的空间格局,成为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石。在与本地房东混居的过程中,沙村流动人口的集体身份,也通过两者间的日常互动交往,通过各自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再建构,经历了一个由“外来人”向“客居人”转变的符号转型过程。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单位 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 上海 20023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Li Wei Liu Neng

Abstract: This study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settle down in Sha Village. We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identity formation. We argue that the special living pattern in Sha Village form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the identity 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pecifically, the co-habitation and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native landlords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dentity as a way of earning a positive social existence. It also results in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floating population” to “guest Beijing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在城市化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过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场所发生了巨大转换:他们从一个同质性的、情感性的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异质性的、工具性的现代城市社会之中;他们的身份,也面临着重新建构和再确认的过程^[1]。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问题,成了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在许多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顽强地生存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经济承担能力的缘故,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居住着,并以他们独特的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楔入现代都市文明之中,也楔入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身份也面临着重新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外来流动人口身份建构的空间过程》。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外来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模式和社会控制对策研究”(批准号:06AaSH00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时期中日城市社区公共性培育模式比较研究:以上海和福冈为例”(批准号:2014ESH003)。

构建和确认的过程。在某些学者看来,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列的、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2]。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学术界针对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采用“制度建构”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从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出发,探讨城市外来人口政策、制度及法规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强调政策、制度的变革及其对外来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以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为例,受这一制度的挤压,流动人口只能作为“弱势群体”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空间里,并逐渐沉淀为城市边缘人口^[3]。面对这一制度性的强加身份,流动人口只能被动地认同和接受。

但是,学术界陆续对“制度建构”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过于偏重政策和制度方面的考量,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差异性对外来人口身份认同过程多样性的影响,并且无法解释在不利政策和制度环境下,那些选择继续留在城市的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4]。事实上,外来流动人口中的每一个行动个体,其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和接触,会因为各自的生命历程,以及不同城市的文化氛围而有所差异。相应地,外来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也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彭远春从主体性角度出发,探讨了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认为进城期望和城市遭际(城市适应状况)这两个因素对他们的身份认同走向起着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5]。王春光则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社会记忆的互动视角出发,揭示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和社区认同上表现出来的代际差异,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较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上更具模糊性^[6]。此外,郭星华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在现实中并不是同质的和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呈现出身份认同的二重性特征^[7]。以上研究表明,针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逐渐从制度性的宏观层面,过渡到强调流动人口主体性认知的微观层面。本研究将延续微观层面的讨论,强调外来流动人

口作为活跃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并透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来考察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构建问题。

由于居住空间是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社会行动最重要的发生地,是人们最有可能形成持久亲密关系的场所。西方社会的移民研究表明,移民在同一城市空间的过度集中,势必会产生独特的城市空间类型^{[8][9][10][11]}。近年来,中国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方式,经历了从聚居向混居的变化:在初期,外来人口主要以地缘、亲缘或业缘关系为基础形成聚居区,比如北京的“浙江村”^{[12][13]}、“河南村”^[14];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这一类聚居区形成的机制、聚居社区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与外部社会的交往。后来,随着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增加,基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形成的聚居区,被异质性更强的混居型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取代,如广州的石牌村^[15]、上海的“虹桥西”^[16]等。本文的研究地点沙村同样属于这一类混居型聚居区。以这一空间类型为背景,这里将居住空间纳入到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过程之中,探讨他们是如何在与本地住户共享的居住空间里,建构起自身身份的。

(二)关于“身份建构”“居住空间”及“客居人”概念的澄清

我们把外来流动人口主动回答自己是谁,并在城市和乡村这两大社会空间之间分配自身地域认同感的社会过程,称之为身份建构。有关身份建构的研究认为,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过程^[17]。与此同时,这种身份建构过程,又是一个从一般性到特殊类别的过程^[18]。社会学建构主义的倡导者 Berger 和 Luckmann 曾经指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种种要素,如语言、行为等,都有助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做出辩证性的描述^[19]。由此可见,在制度性的建构之外,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个体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建筑学家沙里宁认为,住房至少应当包含家园和健康的环境这两重含义,而不仅仅是遮

风避雨的墙壁和屋顶；住宅不仅仅具有居住的功能，而且也是推动和约束社会关系的场所^[20]。由此，居住空间的含义，不再是城市地域空间内某种功能建筑的空间组合，它还是人们居住活动所整合而成的社会空间系统。作为一种空间系统，它与场所相对应，具有特定的区位、相对独立的范围等地理位置特征；但是作为地域—社会复合系统，它还应具有社会关系的内涵^[21]。这里所指的居住空间，同时兼具物质结构空间和社会系统的特征：它既是由人们的居住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开放性空间，又时时刻刻反映着当下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包含多重关系的空间。

访谈过程中，在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时，沙村访谈对象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算是北京的一员，但不是北京人，算是客居在北京吧”。这是外来租户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户籍制度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获得“北京人”的合法身份，但在长期居留北京的过程中，他们与本地居民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和交往，对本土社区也逐渐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归属感。借用访谈对象的表述，这里以“客居人”一词来描述流动人口在本土社会中，通过一种特殊的身份磋商过程所建构起来的特殊身份：这是一种介于“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过渡性身份。

（三）研究地点与资料来源说明

沙村地处北京市北部郊区，位于北五环以外，北六环以内，属于昌平区北镇管辖，距市中心约 20 公里。常住户籍人口 366 户，共 1333 人；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约 7600 多人，多为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沙村相对廉价的租金、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治安状况、熟悉的人文环境以及相对宽松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吸引着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到此聚居。随着外来流动人口的进入和聚集，沙村本地住户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外来流动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沙村也逐渐转变为异质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即本土居民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的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类型^[22]。

这里所使用的访谈资料和数据，均来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

城乡结合部外来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模式和社会控制对策研究”的项目调查资料。该课题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性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式个案访谈法，对 20 位居住在沙村的外来租户和 3 位“二房东”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式访谈。

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身份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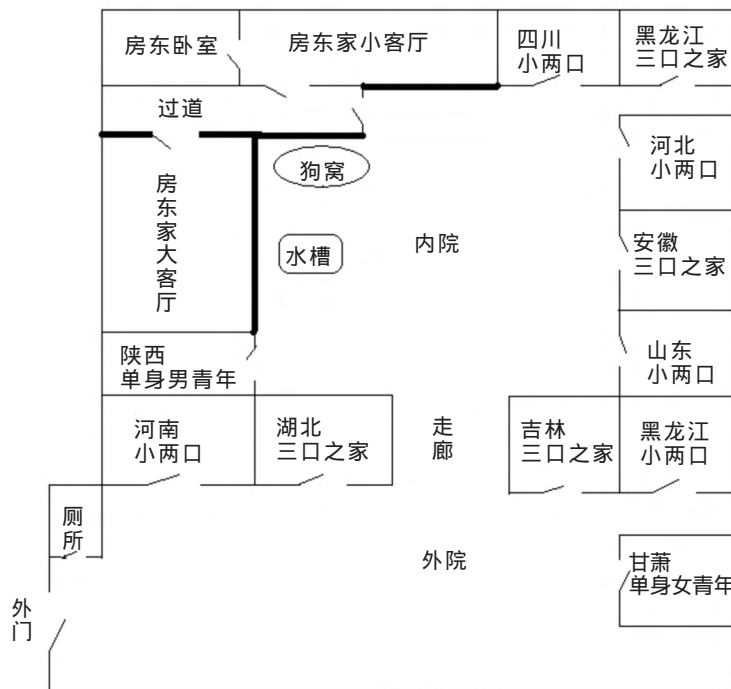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沙村不同于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和“新疆村”之类的同质性族群聚居区，村内的外来租户，其户籍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外来租户之间也没有明显的亲缘或业缘关系。沙村既有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沙村本地农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还有来自全国各城市地区的已经城市化了的外来流动人口。这些外来流动人口齐聚沙村，成为了这里的外来租户，并分散居住在各自的房东家里。接下来，我们将从居住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的建立三个方面来考察外来租户在共居空间中形成新的身份认同的互动过程。

（一）居住安全感：居住监控的未预期社会后果

图一（下页）是沙村典型的平房式共居院落的格局平面图，沙村的许多共居院落都具有相似的院落格局。这种院落格局似乎与生俱来就具备便于监控房客的特征，又或者，这样的格局，是在房东的精心设计下形成的。

这是一个分内外院的共居院落，从院落房间格局安排来看，内院一共有 2 间房东自用的客厅，1 间卧室，一个共用的水槽，1 个狗窝，以及 6 间用于出租的房间；外院则有 5 间房用于出租，内院的门位于正南面，在内院与外院之间，是一条走道，而外院的西南角，就是整个院落的大门，大门的方向朝西面。入门北面便是院落内的公用厕所。在这个共居院落里，房东家自住的房间和客厅位于内院的西北角，其中包括 2 个客厅和 1 间卧室。

需要指出的是，从院子进房东家需要迈两层台阶，也就是说，房东所住的屋子，地势要高于租户所住的房间。这一方面是房东出于对自



图一 沙村某典型平房式共居院落的平面格局

注：加“——”线的位置是大片的玻璃窗。

身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较高的地势也有利于房东对院内租户行为的监控。此外,图示中所有用黑色加粗线标记的墙,均由大片玻璃窗组成,其中包括房东家的两个客厅。透过大片的玻璃窗,房东可以轻而易举地观察到院内租户的一举一动,从而便利了房东对院子内的外来租户的活动的监控。在该共居院落内,公共水槽的位置紧邻房东客厅东面的墙,而水龙头就设在这个水槽里,这是整个院子里唯一一个用水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每位房客每天都必须经过房东的视线。无论是通过掌握了有利的地理观察位置,还是通过公共设施的布置格局而贴近房客们每天都要进行的生活活动(在这里指的是取水和用水活动)来获取房客们的基本信息,房东们至少掌握了信息搜集和实时监控的有利条件。

沙村的外来租户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房东家里,每家都有不同的房东和租户关系,但不同的居住院落内,房东对租户的日常监控策略却基本相同。沙村房东对外来租户的监控,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去的。在沙村,由于

用于出租的房屋大部分都没有安装暖气管道,外来租户冬天取暖只能靠烧煤,而冬天在封闭的室内烧煤炉具有很大危险性。因此,煤炉的使用,也就成为了房东对居住安全性进行监控的主要内容。

冬天的时候,这里没有暖气,是靠烧煤取暖的。如果有人比较反常,在正常时间没起来,房东会去敲门,确定没事了才安心走开,因为怕煤气中毒。上次住我对门有个女孩,一天没动静,那阵子又正好是冬天,房东很担心,以为是煤气中毒了,就开门进去看看,里面没人,后来才搞清楚那女孩子因为有事,出门比平时早了。这说明房东一直很关心我们,注意我们的安全。房东就像是大家庭的一个老大一样。——租户 I

正如租户所描述的,房东就像一个“大家庭的老大”、“大管家”,经营着共居院落空间,其对外来租户的居住安全所采取的一系列监控策略,有效地维持了共居空间内的微观社会秩序,同时也降低了外来租户的居住风险。此外,沙村的房东基本上都有充裕的时间用于租房管理,而借助与租户的聊天来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工作情况,掌握租户的基本信息,是房东们最快捷、最有效的居住安全监控策略。

每天下班回来,我都到院子里的水槽来洗东西,房东在她家客厅里见着我了,就会走出来跟我唠会儿嗑。房东会跟我开开玩笑,问我做什么的,能赚多少钱啊,有时候还问到我家里的情况。房东年纪跟我父母差不多,挺像我父母的,我因为离开父母很久了,很久没有体验过亲情的感觉,在房东身上多多少少会找到一种亲情的感觉,所以也很愿意跟她聊天。——租户 P

有时候房东看我白天不出门,老在屋里呆着,就会问我,今天怎么没上班?我说今天失业了,她就会跟我开玩笑说,怎么又失业了。房东看我们没工作了,就会比我们自己还着急,呵呵

估计是怕咱交不起房租吧。她经常会给我们提供工作信息,像我的上一份卖窗帘的工作,就是房东给介绍的,也就是晚上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居然之家要招人卖窗帘。房东有时候也会给院子里做买卖的那些人提供这个村子的商业信息,说可以在这边开店做生意。房东在这里住久了,知道做什么生意好做,会给他们提建议。——租户 D

也就是在这种家长里短的聊天里,房东主动拉近了与房客的距离,也逐渐摸清每个租户的情况,而对外来租户的信息掌握得越多,房东也就越有安全感,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实施有效的居住监控策略。此外,正如租户 D 所说的,房东对于失业的外来租户总是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房客经济来源的稳定,也是房东房租收入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出于对经济安全与居住安全的考虑,房东会主动为暂时失业的外来租户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相关就业信息、本村的商业信息等。在沙村,本地住户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这是一种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力量,他们通过与外来租户的租房关系和日常的接触来实现其社会控制策略。也正是这种建立在日常紧密互动基础上的监控,使得外来租户的行为得到制约,这种行为的节制,带来了更好的安全保障和犯罪率的降低,改善了个体和家庭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了居住安全感。此外,“我在这住着,是这个院子里的一员,就应该遵守院落的秩序,”日常生活中对本土社会秩序的遵守,拉近了外来人口与本土社会的距离,也影响着流动人口在本土社会里的身份重构。

(二)归属感:居住空间建构作为身份磋商的一种策略

在奥罗姆看来,个体对地点(空间)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种身份认同感,一种说明“我们是谁”的感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一种舒适感;一种社区感,成为一个大集体(家庭或者邻里人群)的归属感;一种过去和将来感(时间感);一种我们身后和我们面前的地点感^[23]。个人与其生活空间有着强烈而亲密的关系,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产生某种相似的、建立在

其居住地之上的个人身份认同感及社区归属感。尽管沙村只是多数外来租户的暂居之地,但是对于与自己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着的居住空间来说,他们还是倾注了一些心血,并努力使自己的居住空间更有“家”的感觉。

这间屋子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一个落脚的地方,这是属于我的私人空间,我每天晚上都要回家,也就是回这个屋子,除非是赶不上公车了,实在没有办法我才会借住在朋友家里。我老觉得每天不回这里,心里就挺不安的。在这住这么久了,怎么说也算半个沙村人了吧。——租户 P

我觉得住在这了,这里就是家了,回来感觉心里比较踏实,跟住宾馆是两码事。如果真有一天要离开这儿,肯定会很舍不得的,我是很念旧的人。肯定要回来看看。我原来在南三环住,前阵子还回去看看,也顺便看看在那儿结识的一些朋友。——租户 A

研究团队从访谈中可以深切地了解到,外来租户目前所租住的房间,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访谈过程中,诸如“回家”这样的字眼,经常不自觉地出现在他们的嘴边。在笔者看来,外来租户与他们所租住的空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发生了亲密的关系。因为居住在沙村的外来租户,均是来北京打工的外来流动人口,他们是一个个漂泊的、流动的个体,工作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居住地对他们来说,则是相对稳定的因素。这个“家”,能使漂泊的心安静下来,也正是这样一个较为稳定的居住空间,给予了他们一个固定的居留地以及“家”的安全感。正如被访者所说的那样:“只有每天晚上回到这个住所,心里才能感到踏实、安全。”此外,大多数被访者在谈到以后可能离开沙村的时候,普遍都流露出对沙村居住空间的留恋,并有较强的再次回来看看自己曾经居住过的房子的愿望。在笔者看来,这种普遍存在的怀旧感,反映了沙村外来租户对其居住空间的怀念,而这也反过来说明了这一居住空间对外来租户来说,是具有特别意义与价值的、值得怀念的地点。外来流动人口对居住空间的归属感,将进一步影响其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与当地居民的互动

状况,以及自我身份的重构。

(三)认同感: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建构

传统农村社区中,人们守望相助,关系密切,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富有人情味,家庭、邻里、亲属等社会关系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沙村作为一个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的京郊农村,仍然保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生活方式,而居住在沙村的北京本地农民,也仍然保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人情关系。当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农民楔入到北京当地农民的居住空间里,当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原本普遍存在于农村社会中的邻里守望相助关系是否依然存续,又或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这边的本地人对外来人口还是挺好的,至少对我还不错。这里的北京人还是很憨厚的,都是外地人多了,才把这儿的人也带坏了。这边原来不也是农村嘛,各方面都跟我们老家差不多,比如我们老家那边就特别注重这个人情关系,农村人都特别注重这个,沙村这边也一样,住在一块就得互相去了解,住在一起也是一个缘分,有什么要帮忙的就互相帮忙,农村人都比较热情嘛,所以在这边关系处得不错。——租户 A

这里人比较朴实,没有架子,不是说我是当地人,我是北京人,我就特别牛似的,没有这种感觉。挺朴实,挺和蔼可亲的,容易接近。但是北京城里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个牛逼哄哄的,对外来人口也特别歧视。嗨,有时候你就是坐在公交车上或地铁上都能感觉到那种歧视的眼光。她拿那种眼神看你,好像觉得我们外来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很脏,生怕碰到我们似的,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有时候也会讽刺你。有时候我就假装没听见,有时候听到不好听的就回两句。——租户 M

以上访谈资料表明,沙村外来租户中的外地农民,对沙村本地农民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朴实、友好、不欺生、没有架子,是他们对沙村本地农民的普遍评价。对农村社会的认同感,以及相同的农民身份,拉近了外地农民与沙村本地农民的心理距离,“我们都是农民,跟家乡人一样”的感觉,让外地农民在与沙村本地住户的相

处中,显得更为自如。“农村人都比较热情”,对农民身份强烈的认同感,使得外地农民更愿意与本地村民进行交流,而这将有利于二者之间的互动。此外,对人情关系的看重,是农村社区最为强调的,也是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沙村仍然保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这使得外地农民在这里能感受到与老家相似的浓厚的人情关系,也有利于外地农民更快地融入本土社会。另外,在外地农民看来,自己与沙村本地人虽然都是农民身份,但是沙村的本地农民毕竟是北京的农民,他们有着更优越的福利与待遇。

三、总结与讨论

所谓的移民空间,一方面是指通过移民网络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生存和生活空间,它是具体的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这种移民空间也是一个经受排斥和竞争双重作用的身份空间。对城市而言,这种移民空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群或居住区,而是一个典型群体的空间符号和身份符号^[24]。撇开城市物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移民空间也是移民身份获得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这种移民空间的产生,使得“外来人”身份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重构,缓和了由于物理空间迁移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身份危机,使移民群体在新的居住空间中能够延续和维持原有的农村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同时,这种被抽象化的移民空间也成了一个群体身份确认和认同的重要基础。

在城市社会仍然对外来流动人口实行封闭,外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途径依然狭窄的现实情况下,作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沙村,为外来租户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是一条代价相对较小、较为可行的在城市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途径,有利于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推动其城市适应过程^[25]。沙村外来租户携带着其文化传统进入沙村本地人的生活,并在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中,不断地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努力使自己成为沙村“居民”。居住,对

沙村的外来租户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更是一个涉及语言、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社会行为或文化行为。在沙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居住监控给外来租户带来了居住安全感;而建立在居住安全感基础上的居住空间的建构,则在无形中发生出一种“家的感觉”,即归属感;在与本土居民的频繁的日常交往中,外来租户可以接触到更多的现代性理念和生活方式,无形中消解着他们乡土性的关系和集体意识,使其社会认同增加城市性的元素,进而促进其实现从“外来人”到“客居人”的身份重构。

参考文献

[1]蔡禾 曹志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48~158页
 [2]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9~132页
 [3]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理论月刊》2006年第10期,第5~12页
 [4]张广利 张瑞华:《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5]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第81~90页
 [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76页
 [7]郭星华 李飞:《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人口研究》2009年第6期,第74~84页
 [8]Beers, Howard W. The Urban Status of Rural Migrants. Social Forces, 23, 1994.
 [9]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10]Erman, Tahire. Becoming “Urban” or Remaining “Rural”: The Views of Turk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0, 1998.

[11]Harvey, David. The City and the Space-Economy of Urbanism.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 1972.
 [12]项飏:《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13]Zhang, L.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 are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25]唐灿 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72~85页
 [15]刘梦琴:《石牌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兼与北京“浙江村”比较》,《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5期
 [16]孙中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特质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
 [17]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89~94页
 [18]Somers, Margaret R., Gloria D. Gibson.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Craig J.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19][24]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第175~188页
 [20](美)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
 [21]吴启焰:《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0年
 [22]狄雷 刘能:《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市场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71~77页
 [23](美)奥罗姆 安东尼 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曾茂娟 任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编辑、校对:张晓月)